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Le Singe et le Tigre

Mao, un Destin Chinois

毛泽东 雄关漫道

下
册

典藏本

[法] 阿兰·鲁林 著

Alain Roux

毕笑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Le Singe et le Tigre

Mao, un Destin Chinois

毛泽东
雄关漫道

下
册

典藏本

[法] 阿兰·鲁林 著

Alain Roux

毕笑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雄关漫道：典藏本/（法）鲁林（Roux，A.）著；
毕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9895-8

I. ①毛… II. ①鲁… ②毕…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传记 IV. ①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249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雄关漫道（上下）
典藏本
[法] 阿兰·鲁林 著
毕笑 译
Mao Zedong: Xiongguanmand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57.5 插页 6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36 000	定 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冷 溶 逢先知 龚育之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忠杰 李君如 章百家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牛大勇	冯筱才	朱学勤	任剑涛
许纪霖	杜 蒲	李向前	杨奎松	宋新宁
沈志华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韩 钢	景跃进	程 农	

目 录

第三部分 领袖(1945—1976)

序 459

第十一章 胜利者 (1945—1949) 461

第十二章 激进的创建者(1949—1956) 504

第十三章 理想主义 (1957—1959) 556

第十四章 内外交困 (1959—1962) 602

第十五章 发动“文化大革命” 641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1966—1969) 682

第十七章 失误无法避免(1969—1976) 729

结 语 783

注 释 798

参考文献 885

第三部分

领袖（1945—1976）

序

1959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坐车前往庐山，在那里他召集了一场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他的大脑中充斥着各种关于第一个十年社会制度计划的问题。经过长期内战夺取政权之后，这十年“日月换新天”。当汽车开始转弯的时候，因夏天的季风气候而下了几个月的雨突然停了：在重新变蓝的天空下，毛泽东看到他的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长江平原和鳞次栉比的金色稻田，在这个季节，人们准备收割了。雨过天晴让兴奋的毛泽东创作了一首律诗，这首诗的韵律和前几天他到达韶山作的诗一样。一到达目的地，他就用刚劲有力的字迹写下了这首诗^[1]：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2]，浪下三吴^[3]起白烟。
陶令^[4]不知何处去，桃花源^[5]里可耕田？

在主要的政策更迭的前夕，毛泽东的情绪变得更加激进。

我们认为政治局戏剧性的庐山会议和1959年7—8月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形成了过去31年的一道分割线：

——1945—1949年，毛泽东是一位征服者（第十一章）。

——1949—1956年，他是一位急于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创

造者（第十二章）。

——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实践理想主义（第十三章）。

——1959—1962年，理想主义下的内外交困（第十四章）。

——1962—1965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第十五章）。

——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成为第二场灾难（第十六章）。

——1969—1976年，毛泽东错上加错。直到这一伟大的掌舵手过世的时候，拿白吉尔的话来讲，中国还是一个“脆弱的大国”，但是“后毛泽东”的巨大转变已经初露端倪（第十七章）。

在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遵循了一条不完全是独创的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指挥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毛泽东将他的基础放在农村，他在开辟出自己的道路之前，遵循苏联已经为他设置好的路线来构建社会主义。1945年党的七大公认的他“思想”至高无上。在1953—1955年间，他不合理地加快土地集体化并决定大型生产和交换方式由国家管控。他将一切强加给一个政党，而党内大部分领导人并不希望加速这些步骤以达到社会主义。

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集权与日俱增，要走的道路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这条路沿着绝壁前进，通向死路，受到崩塌的威胁。之后荒唐的暴力达到顶点——“文化大革命”——混乱险些吞没社会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一个新的中国慢慢出现了，个人利益取代了毛泽东的道德主义，对个人的肯定动摇了儒家的传统，经济规则不再是不为人知的了，人们更追求一种平凡的幸福，而非恐惧之下强迫的道德。毛泽东绝对不希望这样一条道路代替他提出的道路，他一定会尽自己的全力来推迟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模糊而又致命的乌托邦的舍弃。残酷的疾病侵入他的身体，这位神一般的人物就这样开始陨落了。

第十一章

胜利者（1945—1949）

1927年夏天开始的国共内战此时已经接近尾声，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性转折：1945年8月末，重庆谈判徒劳无果，人们迎来一个听到越来越多枪声的不明朗时期。1946年夏，双方的敌对状态全面升级。1946年夏至1947年夏，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农民战争。1948年年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取得了三次决定性的胜利，威望达到顶峰。从1949年年初开始，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回到了久违的城市，这一切都成就了毛泽东式的胜利。然而与古罗马不同的是，1949年10月，在胜利者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人提醒毛泽东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徒劳的谈判（1945年8月—1946年6月）^[1]

1945年8月28日下午三点，经过四小时的飞行后，C47军用飞机从延安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该机场位于长江上的一座岛中央。神情忧虑的毛泽东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小型欢迎团前来接机，毛泽东匆匆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样的气氛对如此重大的事件而言显得有点异常。正如第二天非官方日报《大公报》所言：“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一次国家元首之间的会面。蒋介石给了毛泽东一个下马威：最高统帅接见毛泽东，只不过如同让一个有异心的省级领导来此地见识

他的权威。^[2]《大公报》还写道：“毛泽东先生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边境^[3]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人们既没有忘记他抗争的过往，也没有忘记他和一位二战官方胜利者之间仍有差距。对于这次和毛泽东等人的会面，蒋介石只派出了两位较为次要的负责人，一位是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周至柔^[4]，一位是并没有多大实权的国民党旧部邵力子^[5]。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蒋介石的接待委员会里包括了七名反对其专制制度的异见分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和郭沫若^[6]，此外还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三位负责人。仅有一位摄像师随行，众人驱车前往国民党上将张治中的公馆“桂园”别墅，让毛泽东在旅途的劳累过后可以稍作休息。当晚，毛泽东出席了在蒋介石住处“山洞林园”^[7]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宴会桌上，除了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的身影之外，各界的民主人士，如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和周至柔^[8]也参加了晚宴。毕竟在偏远的农村里摸爬打滚了十八年，初次回城的毛泽东显然有些狼狈，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过来，并且知道如何把这次到访当成一件大事来做。为了达到目的，毛泽东部署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安排会议和会面、礼节性参观和私下会晤。^[9]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总结当天的主要情况，准备资料以便第二天和周恩来、王若飞还有秘书胡乔木进行讨论。毛泽东在蒋介石安排的林园套房^[10]内住了三天，期间受到了严密监视。三天后他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位于红岩村一条胡同的尽头，这里很安全，只是地处郊区，不方便安排会面。因此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张治中的邀请，借用了张治中^[11]的公馆上清寺桂园，也就是他刚到重庆下榻的地方，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桂园位于重庆市中心，北倚嘉陵江，建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作为天生的政治外交家，毛泽东对于各种访谈都应付自如，他与美国第14航空队，即著名的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统领的“飞虎队”的三位飞行员合影，与重庆的故旧碰面，并接见了几十位各色人士。他几乎每晚都出席晚宴或酒会，在应邀到苏联领事馆参观的时候，毛泽东与美国领事

再度会面，并结识了英国和法国领事。9月1日，在由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一场有三百多位来宾的酒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酒会的入口处有一小队人对他表示欢迎。刚到重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准备好拜访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只等她从莫斯科回来便登门。两个月内，毛泽东几乎拜访和接见了“整个重庆的人”。在毛泽东的联系人当中，他自然优先考虑会见蒋介石的对手，比如民盟和其他党派的领导人，还有国民党的叛徒。事实上他与国民党的元老也有所接触，包括像陈立夫和戴季陶这种坚决的反共分子。^[12]其中有两次会晤格外引人注目：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民盟总部（又被誉为“民主之家”）与民盟主席张澜会面，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和平谈判的六点原则的声明：坚持维护国家和平，建立民主政权。张澜认为“很公道”。但他同时提醒毛泽东要提防蒋介石：“蒋介石在摆鸿门宴，他是不大讲什么信义”。毛泽东却认为应该利用蒋介石的话做文章，并且依靠公众的压力迫使他施行新政，“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另外一次传为佳话的会面是在到达重庆初期与柳亚子^[13]的会面。毛泽东把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而这位留着长胡子的老诗人把这首词稍作修改之后发表在报纸上。毛泽东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君王一样，不仅有政治才华，还是书法家和诗人。除此之外，毛泽东和颜悦色的谈吐让他成为一个理智的和平爱好者，相反他的对手们却拙于隐藏自己的敌意：驻华美军总司令阿尔伯特·魏德迈8月30日与毛泽东会面的时候，以威胁的口吻警告毛泽东：“美国计划往中国派出五十万军队并投射原子弹”。毛泽东十分冷静，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手段。同一天，当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特派将军卡通·德·维阿特对毛泽东宣称共产党的部队其实并没有对日军造成什么打击的时候，毛泽东也只是一笑置之。^[14]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是多么老练的外交官都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了。

从8月29日开始，与国民党的谈判以缓慢的节奏进行着。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三角组合，蒋介石仅在第一次和最后

一次会议上露了面，其余时间由三位国民党高官王世杰、张群和张治中出席。这期间总共举行了12次工作会议，有时毛泽东独自一人到会，有时邵力子也参加。10月5日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周恩来通知大家，鉴于毛泽东已经离开延安一个多月了，本周必须回去。周恩来向国民代表大会提议整理一份会议记录，列出双方达成共识的地方和有争议问题的矛盾所在。8日，双方代表听取了这份文件的最终版本，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当晚在桂园举行了一个500人的晚宴。席间毛泽东发了言：“现在全国人民、各国友人都很关心我们所谈的问题”。毛泽东对谈判结果表示乐观，“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除了和平解决之外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他补充道：“可是困难是有的。”“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三民主义。”^[15]最后这充满和解意味的总结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的邀请回到林园，与包括宋子文^[16]、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在内的社会名流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单独会面。蒋介石又尝试就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但毛泽东再次拒绝了这个他认为意味着“弃权”的要求。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下午，周恩来和王若飞在桂园客厅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应邵力子的邀请，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与谈判人员握手。下午4点，蒋介石来到桂园，与毛泽东进行了十分钟的交谈：蒋介石用漂亮的楷体字把名字签在了毛泽东的草书签名旁边。然后两位代表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席间，满面春风的毛泽东以一句客套多于真心的“蒋委员长万岁！”向大家祝酒，一位著名的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个瞬间：照片里的毛泽东举起身旁的酒杯，脸上微微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当晚，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并与蒋介石再次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之后宿于林园。11日早上，在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蒋介石坚持己见，而毛泽东则巧妙地回应：协定签订才是协商的开始，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跟进。由始至终，面对怀恨在心且咄

咄逼人的蒋介石，毛泽东都表现出了愿意避免内战、共商和平的积极态度。与蒋介石相反，毛泽东给因为 30 年内外战争而筋疲力尽的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

上午 9 点半，毛泽东来到机场，现场有 500 人前来欢送。毛泽东与众人握手道别，对负责安全保卫的国民宪兵表示感谢^[17]，并在飞机旁与张群、陈诚、张治中以及民盟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陶行知^[18]及其夫人合影。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飞机于上午 9 点 45 分起飞，下午 1 点 30 分到达延安。

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于 10 月 11 日由新闻部公告发出，然而这份协定到头来只是一纸空谈。从 8 月中旬开始，争夺日占时期的大部分城市以及南京政权余部控制权的问题使双方的紧张气氛开始攀升。在重申“民主化、统一军队以及在法律上承认所有的抗日党派（指共产党）”这些双方共同目标之后，“双十协定”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制定新宪法。应该注意到国民党对共产党其中一个基本要求选择了沉默，那就是立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表面上看来，“双十协定”是共产党的另一次让步，但实际上共产党计划逐步实施削减军队措施的八个解放区是他们力量非常单薄的地方。相反没有任何协议能够让他们同意削减另外十个解放区的军队，因为这些解放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是共产党牢牢扎根的地方。

蒋介石的美国后台

消息在同一天之内相继传来：美国海军已经在青岛登陆；三队美国空军今后将在青岛、北平（北京）^[19]和天津驻扎。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海域上频繁活动，53 0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以接收日本投降部队的名义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10 月底，由 235 架达科他战机组成的美国第十航空队从缅甸、四川、云南往上海、武汉、天津和北京运送 11 万名国民党士兵：共产党在这场控制城市的速度赛

中败北。然而在中国的北方，苏联红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了东北。8月14日，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结盟谈判达成了协议，苏联红军表示11月15日之前不会撤出任何占领的城市，而中共领导层此时牢牢把握住了时机，决定从8月29日开始，赶在国民党部队抵达前深入到中国东北各个城市去。^[20]苏联军队不仅接收了林彪手下的8万名装备简陋的士兵，慷慨地向他们敞开了自家军工工厂的大门，甚至还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投降军队^[21]也交给了中共：于是到年底的时候，林彪麾下已经有30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了。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在1945年10月17日参加中共领导层会议，发表了对于当前形势的冷静总结^[22]，认为国民党确实作出了某些让步，但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只要是能进攻的地方，国民党军队都会侵入，因此务必要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山西省东南的上党战役，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战役中，31 000名八路军将士战胜了38 000名国军，毛泽东对此表示非常满意。针对形势最好的东北地区，他鼓励军队对袭击进行立即反攻：“尽量坚守东北南部，积极争取东北北部。”1945年11月5日和7日，在询问关于贯彻党在农村实行减租政策和恢复生产的进行情况^[23]时，毛泽东发出两条指令确认了这个方针。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在东北，中共在抗日和夺取城镇控制权上把国民党远远抛在后面^[24]：毛泽东在苏联的帮助下在黑龙江建立了横1 000公里、纵500公里的根据地。如果把这块地盘比喻成一张舒适的安乐椅的话，那么椅背就是中苏边界的黑龙江，而扶手就是外蒙古和朝鲜半岛北部：这个安全的后方可以避开蒋介石梦想的致命包围圈。^[25]

然而总体的军事形势却越来越不乐观。11月14日，一支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帮助下在秦皇岛登陆，第二天，这支军队就开始进攻山海关这个连接中国北部东北三省道路和铁路的枢纽。11月20日，尽管中共命令全力坚守，但林彪告知毛泽东，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辽宁的主要城市锦州已经被国民党控制，即将成为下一个必须放弃的重要铁路枢纽。同时，为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紧张关系升级而担忧的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中国战场上的严重损耗后，决定

不再支持中共对抗国民党，他敦促中共遵守8月15日协议中的条款。苏联红军接到命令，让林彪的军队从当前占领的城市撤退，同时停止在东北为阻挡国民党军队入侵而进行的破坏铁路的活动。在要求被林彪拒绝后，多位苏联将军威胁他们的中共同行将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对中共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一种背叛。然而中共还是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让步：11月26日，中共东北局发出一份关于八路军各部队从大城市撤军的指示，这份由刘少奇签发的指示要求全军集中力量到农村中去。^[26]

此时，毛泽东被严重的抑郁症击倒，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他都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27]，直到1946年年初才恢复。在病后的康复期，毛泽东住进了延安朱德司令部的牡丹亭，这是一座开满鲜花的美丽花园，顺着一片桃树林延伸开去。毛泽东喜欢坐在石桌前，和他的长子毛岸英聊天或者打麻将。毛岸英是和阿洛夫医生同机从莫斯科回国的。^[28]在毛泽东生病的这段时间，由刘少奇替虚弱的毛泽东处理所有事务，朱德和任弼时协助，和他在重庆谈判时一样。12月15日，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同一天，他就如何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发出了若干指示。28日，针对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问题，他补充说，预计在三到四年内，国民党在东北南部的势力将会更强大，他们重夺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地区的控制权不可避免。^[29]毛泽东提出，要耐心地在东北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偏远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继而要为建立起一支军队做好部署和安排，务求让士兵的有效人数在1946年年底达到40万。士兵们同时要贡献部分的时间投入到生产当中，避免使当地群众的负担过重。^[30]毛泽东还分析了党在自身不熟悉的地区中会遇到的客观困难，认为必须着手花大力气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解释说明清楚。不用说，毛泽东是暗示东北百姓以往对共产党军队的不良印象仍然存在，以及苏联纵容军队在东北进行掠夺。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大批到达那些苏联即将移交的土地，然而苏联在5月之前不会撤军。^[31]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一批爱国人士来建立与当地群众和名流的关系，这批人是张学良一个兄弟的部下，曾在伪满洲国抗击过日

军。蒋介石在由其部队控制的都市里，建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南方公务员政府^[32]，然而这个政府很快就被人民唾弃。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无疑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内战。

马歇尔的任务

然而，一个消息很快重燃了毛泽东的希望。11月27日的一轮国会投票表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军队不断增长的势头充满焦虑，投票过后，时任美国大使的赫尔利提出了退休的请求。杜鲁门总统随即宣布赫尔利的继任者为马歇尔将军^[33]，并授予他让中国回归和平状态的任务。与其他候选人相比，马歇尔的优势是能够消灭苏联部队在东北延长驻守的所有借口，继而让整个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美国湖。然而这个任务却在本质上自相矛盾：美国虽然怀疑蒋介石的行动，却公开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为国军配备和训练了39个现代化师以及8个飞行大队。在多个场合中，蒋介石都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出行。^[34]不过在最初的时候，这位调停者的偏袒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马歇尔于12月22日抵达重庆，此时国军正在发动进攻，而共产党没有军事办法与之对抗，因此毛泽东不愿就此放过一个阻止国军进攻的机会。23日，由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组成的共产党代表团向马歇尔提出接见请求：代表团向他表达了毛泽东同意停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通过宪法改善中国政府运作的意愿。国民党并没有拒绝其强大保护者美国的要求，尤其是周恩来经过毛泽东的首肯，同意政府派部队到东北南部，让迟迟不走的苏联撤军。1946年1月10日，一份停火协议终于签署，蒋介石承诺在10月份召开一次有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最高统帅的政治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35]：他已经盘算好要利用这次难得的反对者聚会，让局势保持在他的控制之下。尽管蒋介石并不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狡猾又精明的政客，他以位列中国五大领导人之首为荣，要在整个中国重建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希望通过尽快在当地建立政府和军队，以终结日本在1931年吞并东北三省的耻辱。尽管美国提出谨